

方言接触对变调语法的影响^(*)

包智明
新加坡国立大学英文系

摘要

本文以受变调和触因调在变调过程中的行为为基础，定义三个基本变调类型：声调型、高音型和混合型。这三个类型和汉语学界对汉语方言的分类相吻合：官方言是声调型，吴方言是高音型，闽方言是混合型。在方言接触条件下，变调语法中的一些成分会产生变异，但是受变调和触因调的行为不发生变化。方言的类型属性不会因为接触的影响而改变。

关键词：

连读变调，汉语方言，汉语声调学，语言接触，语言变异

语言的结构性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本假设。出于这一基本假设，一些研究语言接触现象的学者认为语言接触对语法的影响是有限的，不威胁语法系统的结构完整性。研究洋泾浜和克里奥尔语的学者一般持比较宽松的态度，认为语言重组可以涉及语法的任何一个层次，决定因素是接触的强度。学界对语法重组的不同意见，和他们所研究的对象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洋泾浜、克里奥尔语是重新组建的语言，外来成分显而易见。但是，在普通语言接触、特别是方言接触的情况下，语法的外来成分不仅少，即使有，也不明显，分析上不容易确定

其来源。当然，这些争议的产生也取决于研究者对语言结构性的认识。从语法角度研究方言以及方言接触给语法带来的变化，在中、西方接触语言学和方言学界还是不多见的⁽¹⁾。

本文从汉语方言变调现象着手，探讨方言接触对变调语法的影响。文章的论证分两个部分：一、我们以变调规则的结构性出发建立一个变调类型；这一类型恰恰和传统汉语方言的界定相吻合。二、通过分析具体方言材料，我们想论证这么一个观点：方言接触可以对变调语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足以改变变调类型。

下文第一节我们介绍变调语法的组成成分，并介绍以调变结构为基础的变调类型。第二节我们考察官、吴、闽方言的变调系统，为类型学奠定经验基础。第三节我们讨论官、吴以及闽、吴接触的变调情况，考察方言接触影响变调语法的哪个成分。第四节谈谈我们分析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五节是全文的总结。

1. 变调语法以及变调类型

在生成音系学发展初期，一些学者，如 McCawley 1968, Hyman 1978, 把语言归纳为三大类，分别称为 **tone**、**accent** 以及 **stress** 语言。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三个英语词翻成声调、高音和重音。从音系结构角度看，最主要的差别是这三个超音音素与其载体单元之间的关系。在声调语言里，声调的载体单元是音节，其标准形式是一个音节对一个声调。在高音语言里，高音的载体单元是高音域 (**accentual domain**)，一个域对一个高音，域的确定因语言而异。在重音语言里，重音的载体单元是音步 (**foot**)。在通常情况下，一个音步有两个音节

组成，与其相对应的重音可以体现在左音节（重轻格）或右音节（轻重格）上。“域”是一个广义概念，除了高音域，音节和音步都可以理解为域的体现。北京话是典型的声调语言，日语是典型的高音语言，而英语则是典型的重音语言。用 σ 表示音节，括弧表示域，这三种语言可以作如下的表述（McCawley 1968）：

- (1) a. 声调语言 $(\sigma)(\sigma)(\sigma)(\sigma)$
 b. 高音语言 $(\sigma\sigma\sigma\sigma)$
 c. 重音语言 $(\sigma\sigma)(\sigma\sigma)$

从域的数量上看，声调语言最多，重音语言次之，高音语言最少。这三种表述方式是不是同一种深层结构在不同语言里的具体表现，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课题，本文不打算讨论。就汉语而言，每个字（等同一个音节）都有声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方言都是声调语言，这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吕 1980，王 1999，Chen 2000，Bao 2004）。这三种语言的变调有特殊的音系学特征，变调语法也有其特殊性。下面我们就从变调语法的角度，探讨汉语方言的变调类型学，为考察方言接触对变调语法的影响打下理论基础。

生成语言学的重写规则一般用 (2) 表示：

- (2) $A \rightarrow B / C _ D$

A 是规则的适用目标，有时也叫作“经历者”（undergoer）； \rightarrow 表示变化的过程，B 是变化的结果； $C _ D$ 是规则的适用环境，或者说是规则的触因（trigger）。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 A 称为本调，把 B 称为变调，把变化过程称为调变。调变有引发和自发两种，定义如下：

- (3) a. 如果使用环境写进变调规则，那么该规则所描写的调变是引发的。
 b. 不是引发的调变是自发的。

要穷尽的描写一种变调现象，除了具体的变调规则外，我们还要确定变调的范围，我们称之为调域（tone domain）。调域确定后，我们还要看调域内部结构是否起作用（cyclicity），并且确定主导音节。主导音节上的声调对整个调域的调形起很重要的作用，具体方式因方言而异：在上海方言里，主导音节的词汇调决定整个调域的调形（许、汤、钱 1981，1982，1983）；在丹阳方言里，主导音节选择词的基调，与词汇调没有音系上的关联（吕 1980）。

此外，有的变调系统表面上看似乎杂乱无章，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分成核心和外围两部分，我们就可以发现核心部分非常整齐，外围部分是造成变调系统杂乱无章的原因。我们把描写外围调变的规则称为外围规则。关于核心、外围变调我们下面在讨论具体语料时还会谈到。

综上所述，一部变调语法由下列六个要素组成。

- (4) a. 邻近声调：起作用（引发的）或不起作用（自发的）
 b. 调变特性：延伸或非延伸
 c. 调域确定：句法直接确定或其他方式
 d. 域内结构：有作用或无作用
 e. 主导音节：线性（左、右）或非线性
 f. 外围规则：有或无

(4) 所列的六要素在变调语法中的理论功能及重要性并不相同。（4a,b）确定调变的结构特性，是变调规则所必须表达的。（4c-e）确定变调规则的适用环境，用 Chen（2000）的话说，就是指挥规则的运行。（4f）则解决剩余的外围变调现象。很明显，（4a,b）是变调语法的核心成分，我们可以把（4a,b）看作是双向特征，用[引发]和[延伸]命名，并定义如（5）。

- (5) a. [+引发]: 声调变化是临近声调引发
 [-引发]: 声调变化不是临近声调引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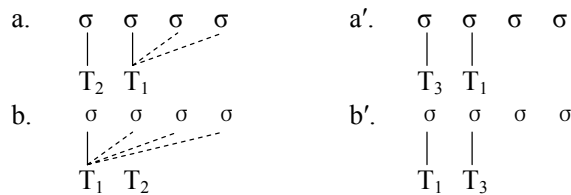
- b. [+延伸]: 变调不局限于其词汇载体
 [-延伸]: 变调局限于词汇载体

由此，我们得出四种不同的变调类型：

(6) 名称	[引发]	[延伸]	方言
声调型	+	-	官
高音型	-	+	吴
混合型	-	-	闽
混合型	+	+	?

我们下面会看到，汉语变调系统大体上可以归为以上三类。声调型的调变是由邻近调引发的，而变调不出于其词汇载体；官话方言多此类型。高音型的调变是自发的，并且会延伸至邻近的音节；吴方言多此类型。混合型兼有声调型和高音型的特征，有两种。一种是调变自发、并在词汇载体中进行；闽方言多此类型。另一种是调变由邻近调引发、并延伸至邻近音节。（7）所列的是这一类型的两种表现形式：

(7) IV型的可能变调式



在（7）式中， T_1 的延伸是由 T_2 引发的；如果 T_2 的位置换成 T_3 ， T_1 就不延伸，见（7a',b'）。根据我对现有材料的观察，还没有一门方言是属于这一类的。由此我们得出[引发]和[延伸]之间的多余（redundancy）关系：

- (8) a. [+引发] → [-延伸]
 b. [+延伸] → [-引发]

(8a,b) 两式在逻辑上是等同的。因为[引发]和[延伸]没有定义上的关联，这一多余关系是对汉语变调系统的经验概括。(8)可以表述为(9)。

(9) 如果一个变调系统的调变规则是引发的，那么，变调不会延伸至邻近的音节；如果一个变调系统的变调会延伸至邻近的音节，那么该系统的调变规则是自发的。

(8)是汉语方言变调类型学的一个重要特性。当然，和其他经验概括一样，这一概括完全有可能被证伪。

2. 汉语变调的三大类型

2.1 声调型

我们先看北京话三声变调。中、外文文献中对北京话音系的讨论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出，读者可以参阅 Chen (2000)。我们的材料取自吴 (1984)。三声变调规则如下：

(10) 214 $\begin{cases} \rightarrow 35 / _ 214 & \text{(a)} \\ \rightarrow 21 / _ \text{非词尾} & \text{(b)} \end{cases}$

也就是说，上声在北京话里有三个不同的体现形式：在另一三声前为 35（同二声），在其他调前为 21，在词尾（包括单字）为 214。相关的例子如下⁽²⁾：

(11) a. 214-[214-214] → 21-35-214
 省美展 老两口
 b. [214-214]-214 → 35-21-214
 展览馆 保险锁

变调的结果和词的句法结构有关：(11a)是单双格，(11b)是双单格⁽³⁾。下面是推导过程：

(12)		214-[214-214]	[214-214]-214
	第一层	(10a) 35	35
		(10b) -	21
	第二层	(10a) -	-
		(10b) 21	-
		21-[35-214]	[35-21]-214

很明显，三声变调是由邻近声调引发的，并且不延伸至邻近音节。

北京三声变调的触因是邻近的三声，调形起重要的作用。有些方言的变调也是引发的，但是触因却是邻近调在中古时的调类。这种现象很多方言都有所表现，如丹阳话（吕 1980）。在这方面，敦煌方言变调的触因，尤为特殊。敦煌方言有三个单字调（所有的材料摘自刘 1988）⁽⁴⁾：

(13)	Ia	24	Ib	24
	II	42		
	III	44		

阴阳平同值，但变调不同。该方言的调变规则很简单，我们可以写作：

(14)	a.	24, 42 → 31
	b.	44 → 4

这两条调变规则的触因是邻调和本调之间的关系。（15）列出所有二字组的变调情况：

(15)	a.	<u>Ia-Ia</u>	24-24 → 24-31
		<u>Ia-Ib</u>	24-24 → 31-24
		<u>Ib-Ia</u>	24-24 → 24-31
	b.	<u>I-II</u>	24-42 → 31-42
		<u>II-I</u>	42-24 → 42-21
		<u>I-III</u>	24-44 → 31-44
		<u>III-I</u>	44-24 → 44-34
	c.	<u>II-II</u>	42-42 → 31-42
		<u>III-III</u>	44-44 → 4-44

其他组合不变。从（15）的变调实例可以看出这样一个变调顺序：

(16) 变调顺序

Ia > Ib > II, III

也就是说，如果平和上、去组合，无论前后位置，平变；如果阴平和阳平组合，阴平变；阴平对阴平，后字变；上对上、去对去，前字变。敦煌二字组的变调系统调变规则简单，但是触因却相当复杂，在汉语方言中可以说是不多见的。刘（1988）没有讨论多字组的变调情况。

我们把北京、敦煌话的变调特性表述如下。对于我们没有讨论的要素，如敦煌话的调域内部结构的作用，我们暂时阙疑。

(17) 官话变调语法之特性

	北京	敦煌
邻调引发	是	是
变调延伸	否	否
结构作用	有	阙
主导音节	右	右
外围规则	无	无

北京话三声变调只涉及左边的音节，我们把调域的右端看成是主导音节。敦煌话后字是在特定的条件下才变调；在没有条件下则是前字变调，我们姑且把它列为右导型。

2.2 高音型

吴方言的内部差异+很大，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钱 1992，曹 2002）。有些变调系统很整齐，如上海话；有些却相当杂乱，非得区别核心和外围两部分方能揭示高音型的特性，绍兴话是一个典型例子。我们先看上海话。

上海话学界的描写、分析不少，主要有许-汤-钱（1981，1982，1983），钱（1992）等。因此，我们对上海话的变调系统有充分的了解。上海话有五个单字调，见（18）（所有材料和分析摘自许-汤-钱 1981，1982，1983）。

- (18) Ia 53
 IIa 34
 IIIb 13
 IVa 55 IVb 12

多字组变调上海话有广用式和窄用式两种。这里我们只考虑用于词组的广用式。多字组的调形是由首字调决定的：首字的词汇调延伸至右邻的音节。具体调形如（19）所示：

- (19) 二字组 三字组 四字组
- | | | |
|--|--|--|
| $\begin{array}{c} \sigma \quad \sigma \\ \diagdown \quad \diagup \\ T \end{array}$ | $\begin{array}{c} \sigma \quad \sigma \quad \sigma \\ \diagdown \quad \diagup \quad \\ T \quad 31 \end{array}$ | $\begin{array}{c} \sigma \quad \sigma \quad \sigma \quad \sigma \\ \diagdown \quad \diagup \quad \quad \\ T \quad 33 \quad 31 \end{array}$ |
|--|--|--|

31 是上海话的预设调（default tone），33 可以是预设调，也可以是 31 调向左延伸的结果。无论怎么看 33 调，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上海话变调系统的总体认识。

多字组的内部结构不起作用。下列四例的结构不同，却有相同的调形：

- (20) 零汤团 13-53-13 → 22-55-31
 洋泾浜 13-34-53 → 22-55-31
 炒冷饭头 13-13-13-13 → 22-55-33-31
 大清老早 13-53-13-34 → 22-55-33-31

这些词首字都是阳去 13 调，按（19）推衍出相同的调形。钱（1992）把上海变调系统称为前主后附型。换句话说，上海话的主导音节是调域的左边缘。

上海附近的绍兴话，虽然变调系统要比上海话复杂的多，但是核心部分还是可以用诸如（19）的简单式子来概括的。绍兴话的单字调很整齐，保留了中古的八个声调。这里，我们只考虑六个舒声调（绍兴话材料摘自王 1959）⁽⁵⁾：

- (21) Ia 51 Ib 31
 IIa 35 IIb 13
 IIIa 33 IIIb 11

阴阳（即声母清浊）影响声调的音高（register），不影响调形（contour）。这是在音系表达上分离音高、调形的有利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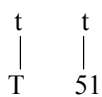
成词二字组的变调情况见（22）。

(22) 成词二字组声调表

		-I		-II		-III	
		阴	阳	阴	阳	阴	阳
I-	阴	33-51	33-51	33-55	33-55	33-55	33-55
	阳	11-51	11-51	11-55	11-55	11-55	11-55
II-	阴	35-51	35-51	35-51	35-51	35-51	35-51
	阳	15-51	15-51	15-51	15-51	15-51	15-51
III-	阴	33-33	33-33	33-33	33-33	33-33	33-33
	阳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11-11

除了首字是 III-外，其他组合的后字都不分阴阳。有三点值得注意。一、首字为 III-的二字组是词汇调的延伸；二、II-不变调，15 是 13 的环境变体；三、I-/II-组合除了-II-/III 为 55 调外，其他后字均为 51 调。二字组的词调基本式只有二个：

(23) a. 首字为 I



b. 首字为 III



T 是阴调的话，调值为 33，T 是阳调的话，调值为 11。（23a）和（23b）的差别是后者 T 会延伸至整个调域（二字组或多字组，见下）。（23a）的 51 调是预设调。表（22）除了 I-II/III 组合外都可以按照（23）的模式推行出来。I-II/III 组合需要一个外围规则。假定（23a）先用在所有的组合上，外围规则在此基础上作一番修饰，我们可以把它写作（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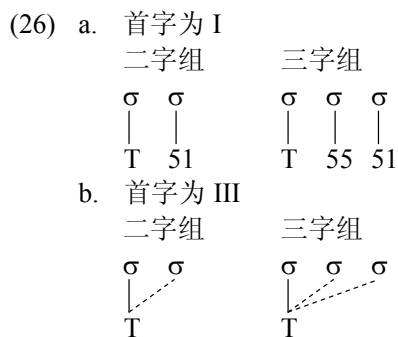
(24) 51 → 55 / I _

也就是说，模式（23a）的 51 调在平调前变成 55 调。

成词三字组的词调及例子见（25）⁽⁶⁾。

(25) Ia-	33-55-51	收音机	天安门
Ib-	11-55-51	参谋长	西红柿
IIa-	35-55-51	思想家	秋海棠
IIb-	15-55-51	千里驹	经纬仪
IIIa-	33-33-33	新四军	公证人
IIIb-	11-11-11	司令官	工艺品

词的内部结构不起作用：“参谋长”和“西红柿”、“思想家”和“秋海棠”的结构不同，调形却一样，都由首字词汇调决定。很明显，这些调式是在二字组模式的基础上产生的。分析如下：



和上海话的 33 调一样，我们可以把（26a）三字组中字的 55 调看作是预设调，或者是 51 调的左延伸。除了预设调的调值和外围规则（24）外，绍兴话变调系

统和上海话有非常相似的地方。这并不奇怪；两个方言都属于吴方言。绍兴话也说明把变调分成核心和外围两部分不但方便分析，还能帮助我们揭示变调系统的类型学上的属性。绍兴话的核心变调是自发的，但是外围规则却是引发的，见（24）。

我们把吴方言变调特征总结如下：

(27) 吴方言变调语法之特性

	上海	绍兴
邻调引发	否	否
变调延伸	是	是
结构作用	无	无
主导音节	左	左
外围规则	无	有

上海和绍兴都是前主后附型。

2.3 混合型

我们用厦门话、永福话和福州话的材料来探讨闽方言变调特征。厦门话有许多学者研究，我们的材料来自 Chen (1987, 2000)、袁等 (1989)。厦门话每个字基本上都有两个调，一个用在词末（包括单念，因此为本调），另一个用在其他位置，即变调。本调和变调的关系是固定的，邻近声调不起作用。厦门的单字舒声调见（28），本、变调的关系见（29）。

(28) Ia 44 Ib 24
 II 53
 IIIa 21 IIIb 22

(29) 24, 44 → 22 → 21 → 53 → 44

为了分析简练我们只考虑舒声调。（29）就是所谓的“闽圈”：阴、阳平变阳去，阳去变阴去，阴去变上，上变阴平。在二字组里，本调出现在下字，变调

出现在上字。用钱（1992）的术语，厦门话属于后主前附型。多字组如果是一个调域的话，除了最后一个音节保持原有的词汇调外，其他音节都用变调。多字组的内部结构不起作用。

厦门话的“闽圈”在闽方言中并不常见；同是闽南话的潮阳变调就比“闽圈”简单的多（见第四节）。闽南方言永福话也没有这种现象。永福话的舒声调有五个，如下（永福话的材料摘自张 1992）：

- (30) Ia 24 Ib 22
 IIa 31
 IIIa 21 IIIb 53

二字组只变前字调，后字调不变：

- (31) 永福二字组变调

	-Ia	-Ib	-IIIb	-IIa	-IIIa
Ia-	33-			55-	
Ib-	33-			55-	
IIIa-	33-			55-	
IIa-	21-				
IIIb-	21-				

入声变调完全可以归入舒声调的变调，因此我们不把入声列在表内。我们把预设调 33-/21-看成是核心变调的产物，55-则是外围调。永福话的核心变调可以用（32a,b）两式概括：

- (32) a. 降调 → 21 / _ 非词尾
 b. 其他调 → 33 / _ 非词尾
 c. 33 → 55 / _ IIa, IIIa

五个舒声调按调形分为两类，每类对应一个变调。（32c）是外围变调规则。

永福三字组是二字组的扩展。从下列例子可以看出，三字组的结构不影响三字组的调形。

(33) 首字为 IIa, IIIb 首字为其他调

σ	σ	σ	σ	σ	σ
21				22	

雪花膏 55-24-24 → 22-33-24

本地衫 31-53-24 → 21-21-24

二字组的规则大致适用于三字组，唯一的差别在调值：二字组的 33 对三字组的 22。和厦门话相比，永福话的变调要简练的多。

最后，我们看福州话。福州话的研究成果颇多，有 Chen & Norman (1965)，李等 (1979)，Chan (1985)，袁等 (1989)，以及李等 (1995)。福州话的舒声单字调有五个，见 (34) (Chen & Norman 1965，转摘自 Chan 1985)：

(34) Ia 55 Ib 52
 II 22
 IIIa 12 IIIb 342

二字组的连读变调比厦门话要简单的多。具体材料如下：

(35) 福州二字组变调

	-Ia	-Ib	-II, -III
Ia-, III-	55-	55-	52-
II-	22-	22-	35-
Ib-	55-	22-	22-

和厦门、永福话一样，二字组后字不变，前字变，因此福州话也是后主前附型。从 (35) 的表格看，最常见的变调是 55 和 22。我们不妨假定福州话有二个基本词调模式，即：

(36) a. 首字为 Ia-, III-

σ	σ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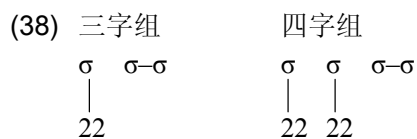
b. 首字为 Ib-, II-



55/22 的选择显然和词汇调的调高有关。上面两个模式概括了福州二字组变调的主要形式，说明福州变调是自发、非延伸的。当然，我们还需要外围规则来推导次要的变调形式。外围规则有三条：

- (37) a. 55 → 52 / _ II/III
 b. 22 → 35 / _ II/III
 c. 22 → 55 / _ Ia

三字组变调很简单，在二字组头上加预设调 22。四字组快读和三字组相仿，前两字都是 22 调，后两字按二字组变调。我们可以用一个模式来描写：



$\sigma-\sigma$ 代表二字组的声调模式。句法结构不起作用 (Chan 1985) :

- (39) 大丈夫 342-[342-55] → 22-55-55
 政治家 [12-342]-55 → 22-55-55

成词的“丈夫”和不成词的“治家”都按二字组变成 55-55，见 (35)。

厦门、永福、福州话变调特征总结如下：

(40) 闽方言变调语法之特性

	厦门	永福	福州
邻调引发	否	否	否
变调延伸	否	否	否
结构作用	无	无	无
主导音节	右	右	右
外围规则	无	有	有

2.4 小结

我们把官、吴、闽方言的变调语法特征放在一起，方便比较。

(41) 方言变调语法之比较

	官		吴		闽		
	北京	敦煌	上海	绍兴	厦门	永福	福州
邻调引发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变调延伸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结构作用	有	阙	无	无	无	无	无
主导音节	右	右	左	左	右	右	右
外围规则	无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3. 方言接触下的变调语法

上面我们介绍了官、吴、闽方言的变调语法。在这三个方言的交界处，变调语法相互之间不免会产生影响。接触条件下变调语法如何变异这一课题，在中、外学界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研究。下面，我们通过分析镇江、永康二方言的变调材料对这一课题做一些初步的探索。我们要论证这样一个命题：用来定义变调类型的要素（引发、延伸）在接触中不受影响，其他变调语法要素都可以产生变异。

3.1 镇江

镇江话是官话方言，离吴语区不远。张（1985）对该方言作了详细的描写和分析。发音人的经历给方言接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生于镇江，二十岁迁上海，三十六岁迁香港，六十三岁始居美国。这位发音人的镇江话是否具有代表性，我们缺乏比较材料，不能确定。

镇江话的舒声单字调和二字变调见（42）、（43）。

- (42) Ia 42 Ib 35
 II 31
 III 55

(43) 二字组变调

	-Ia	-II	-Ib	-III
Ia-	35-	35-	33-	33-
II-	35-	35-	22-	22-
Ib-				22-

前字变调，后字不变。张（1985）给出两条规则来解释（43）所列的变调现象：

- (44) a. 降 $\begin{cases} \rightarrow \text{升} / _ \text{降} \\ \rightarrow \text{平} / _ \text{其他} \end{cases}$
 b. 升 $\rightarrow \text{平} / _ \text{平}$

降调 42, 31 在降调前变升调 35，在其他调前变平调 33；升调 35 在平调前变 22，在其他调前不变。镇江变调系统是引发、非延伸的；这是官话方言的特点。

三字组的变调却染上了吴语的色彩⁽⁷⁾。三字组首字为 33，后二字无论内部结构如何都按二字组变调。这和上海话三字组非常接近，试比较下面两式：

- (45) a. 镇江： $\begin{array}{c} \sigma \quad \sigma - \sigma \\ | \\ 33 \end{array}$
 b. 上海： $\begin{array}{c} \sigma \quad \sigma \quad \sigma \\ | \quad \diagdown \quad | \\ T \quad \quad 31 \end{array}$

镇江话是后主型，预设调 33 出现在词首；上海话是前主型，预设调 31 出现在词尾。镇江话的 $\sigma - \sigma$ 即使不成词也按二字组变调，“金刚经” 42-42-42 和“炒三鲜” 31-42-42 的调形都是 33-35-42。和上海话不同的是，镇江话变调不延伸。两方言的变调特点排列如下：

(46) 镇江话和上海话之比较

	官话	镇江	上海
邻调引发	是	是	否
变调延伸	否	否	是
结构作用	有	无	无
主导音节	右	右	左
外围规则	无	无	无

在吴语的影响下，镇江方言变调域的内部结构失去了作用，此外，镇江话还多了一个预设调 33，调值和上海话的非词尾预设调相同（见 2.2 节）。

3.2 永康

永康地处浙江南部，是南部吴语的一种。袁等（1989）对永康方言作了详尽的分析，我们的材料来自袁等（1989）。永康话有六个舒声调：

- (47) Ia 44 Ib 22
 IIa 35 IIb 13
 IIIa 52 IIIb 241

二字组变调见（48）。

(48) 永康二字组变调

	Ia	Ib	IIa	IIb	IIIa	IIIb
Ia	33-	44-52	33-	33-	44-	44-52
IIIa	33-	33-	33-	33-	33-	33-
Ib	22-	11-52	22-	22-	11-	11-52
IIa	11-	11-	11-	11-	11-	11-
IIb	11-	11-	11-	11-	11-	11-
IIIb	11-	11-	11-	11-	11-	11-

从表（48）可以看出，永康话变调有核心、外围之分，核心部分表面上有下面两个模式：

(49) a. 首字为 Ia, II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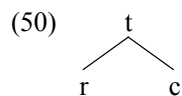
$$\begin{array}{c} \sigma \quad \sigma \\ | \\ 33 \end{array}$$

b. 首字为 Ib, II, II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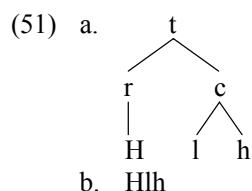
这和绍兴话一样，预设调是 33 还是 11 取决于首字的词汇调：高的选 33，低的选 11。很明显，这两个模式是同一个模式的表面形式。下面我们从声调结构的角度考察这一课题。

我们假设声调 t 由调高 r 和调形 c 组成（详见 Bao 1999b）：



调高有高 H、低 L，调形有平 h、l、降 hl、升 lh。高声调 35 的结构可以表达为

(51a)：



(51b) 是简写式。永康话本调和变调之间的关系如下：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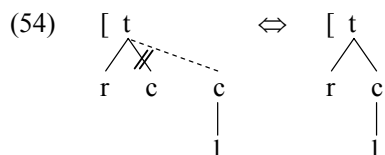
调类	本调	变调
Ia	44 Hh	33 Hl
IIIa	52 Hhl	33 Hl
Ib	22 Lh	22 Lh
IIa	35 Hlh	11 Ll (< Hl)
IIb	13 Llh	11 Ll
IIIb	241 Lhl	11 Ll

除了 IIa 外，H 调变 33，L 调变 11。我们可以认为，永康的词调模式只是一个 l，即：

(53) 永康词调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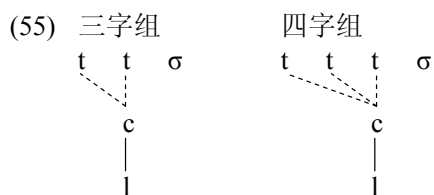


在二字组里，首字调的 c 换成 (53)：



如果 t 是 H，我们有 Hl，即 33；如果 t 是 L，我们有 Ll，即 11。（49）两式就是这样推导出来的。（54）的延伸分析解决了表（48）的核心部分，有三个外围变调现象解决不了。首先，按照我们的分析，高升调 35 的结构是 Hlh，但它的变调却是 11，而不是 33；其次，后字 Ib、IIIb 在 I 前面变 52，在其他调前不变；第三，Ib 调在 52 调前变 11，在其他调前仍然是 22 调。外围变调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在此提一笔。

在多字组里，最后一个字一般不变调，前面的字按（54）变调。也就是说，延伸分析能够推导出多字组的变调模式，即：



我们假定 c 延伸从右向左。三字组的前两调和四字组的前三调维持原有的 r，原有的 c 被（53）取代。下面是相关的例子⁽⁸⁾：

- (56) a. 桂花酒 [52-44]-35 → 33-33-35
 做生活 52-[44-13] → 33-33-13
 b. 门口头塘 [22-35-22]-22 → 22-11-11-52
 西津桥下 [44-44-22]-13 → 33-33-22-13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词的内部结构对词调没有影响：“桂花”成词，“做生”不成词。此外，“头塘”和“桥下”不成词，也按二字组变调。

永康变调语法的特征总结如下：

(57) 上海、永康和福州话之比较

	上海	永康	福州
邻调引发	否	否	否
变调延伸	是	是	否
结构作用	无	无	无
主导音节	左	右	右
外围规则	无	有	有

永康话的变调是自发、延伸型的，只是延伸的形式和上海话不同。在主导音节方面，许多学者指出浙南吴语和闽方言形成一个后主前附型的语言区（袁等 1989，钱 1992，曹 2002）。这点在永康话里得到印证。

为了方便比较，我们把九个方言变调语法排列如下：

(58) 九方言变调语法之比较

	官			吴			闽		
	北京	敦煌	镇江	上海	绍兴	永康	厦门	永福	福州
邻调引发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变调延伸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结构作用	有	阙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主导音节	右	右	右	左	左	右	右	右	右
外围规则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无	有	有

由此我们得出这一经验概括：

(59) 一个方言的变调类型属性不会在接触的条件下改变。

4. 一些问题

上文我们分析了九个汉语方言的变调材料，证明方言接触不改变[引发]和[延伸]这两个具有类型学意义的特征，其他特征都可能在接触的条件下发生变异。本文所探讨的课题可以作两层诠释，我们用弱、强加以区别。弱命题是，[引发]和[延伸]定义变调系统的类型，而方言接触不改变方言的类型属性——这就是（59）的内容。变调类型可以从不同角度探讨，在理论上没有唯一性⁽⁹⁾。因此，弱命题是接触语言学的命题，对汉语语言学、尤其是对汉语方言学，没有多大的理论意义。强命题是，变调类型的界定和汉语方言的界定相吻合。方言和变调类型的界定是互相独立的，如果两个界定相吻合，我们的变调类型学对汉语方言学有一定的经验和理论意义，可以用来裁决毗邻方言分类上可能产生的争议。弱、强命题都是经验命题，必须用实际的语言材料加以论证。虽然我们调查的九个方言的变调系统都符合弱、强命题，别的方言是否也符合，还有待调查。

本文的分析在两个方面可能产生问题。首先，核心与外围的界限不容易划清。上文我们把一个变调系统分成核心和外围两部分，目的是凸显变调语法的系统性和简练性。可是，从外围变调规则的结构看，有些外围变调不符合强命题的规定。以福州话为例，虽然核心变调不受邻近调影响，符合[-引发]、[-延伸]的混合型特点，外围变调是受了邻近调的影响而产生的（见（37））。对强命题而言，区别核心和外围，是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步骤。核心、外围不容易区别的方言很可能成为我们分析的反例。我们还是以福州话为例。学者对方言的描写往往不同，有些差别局限于调值，比如 44 或 55。有些差别很大，影响到

我们对变调整体的认识。试比较 Chen & Norman (1969)、李等 (1995) 福州二字组变调的分析:

(60) a. 李等 (1995) 的福州话二字组变调

	-I	-II	-III
Ia-, III-	44-	53-	53-
II-	21-	24-	44-
Ib-	31-	31-	21-

b. Chen & Norman (1969) 的福州二字组变调 (= (35))

	-Ia	-Ib	-II, -III
Ia-, III-	55-	55-	52-
II-	22-	22-	35-
Ib-	55-	22-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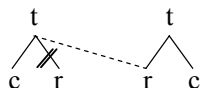
这两个分析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变调系统。44 与 55、21 与 22 是记音差别, 其他的差别反映出两系统的本质差异。在李等 (1995) 的系统里, I-、III- 的变调可以区别核心、外围, II- 的变调却是受了后字调的影响。换句话说, 核心是 [-引发], 外围是 [+引发]。虽然 [-引发] 的变调实例多于 [+引发], 但是和绍兴、永康话的变调系统相比, II- 的变调还是不能和类似 (37) 的外围规则相提并论。外围变调的分析对强命题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 辨认变调是否延伸也可带来麻烦。从表面上看, 闽南潮阳话似乎有延伸变调的迹象。潮阳话二字组舒声调的变调情况——本调、变调以及环境——如下 (蔡 1991, Bao 1999a):

(61)	本调	变调	后字调
Ia	33	33	
IIa	53	35	53, 55
		24	33, 213, 35, 11
IIIa	213	53	53, 55
		42	33, 213, 35, 11
Ib	55	11	
IIb	35	21	
IIIb	11	11	

Ia, Ib, IIb, 和 IIIb 的变调不受后字影响, 符合[-引发]、[-延伸]的规定。IIa, IIIa 却因后字的调高而调值不同: 后字调高 r 若高, IIa 变高升 35、IIIa 变高降 53; 后字调高 r 若低, IIa 变低升 24、IIIa 变低降 42。这是典型的左延伸例子:

(62) 首字为 IIa, IIIa



后字的调高 r 延伸至前字, 取代原来的调高。

潮阳话的变调虽然有延伸成分, 上面的延伸规则应属该方言变调系统的外围部分。此外, 延伸的方向和[+延伸]型不一致: 在[+延伸]型中, 变调是延伸源, 目的地是邻近的音节。这和潮阳话延伸正好相反: 变调是延伸的目的地。因此, 潮阳变调不是强命题的反例。

5. 结论

上文我们分析了汉语方言的几个变调系统, 并从变调语法的角度提出一个变调类型学的方案。我们用触发调、受变调在调变中的行为([引发]和[延伸])来定义汉语方言的变调类型, 并和传统方言的分类相吻合: 官话方言属于声调型, 吴方言属于高音型, 闽方言属于混合型。除了[引发]和[延伸]外, 变调语法的各个要素在方言接触下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一结论表明语言的结构性对接触可能带来的影响是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的。方言接触不影响方言的类型属性。

参考文献

- 蔡俊明(1991):《潮州方言词汇》,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
- 曹志耘(2002):《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
- 陈保亚(1996):《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北京。
- 戴庆夏编(1992):《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
- 李如龙,梁玉璋,陈天泉(1979):福州话语音演变概说,《方言》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页287-293。
- 李如龙,梁玉璋,邹光椿,陈泽平编(1995):《福州方言词典》,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
- 李小凡(2004):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的层级和类型。《方言》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页16-33。
- 刘伶(1988):《敦煌方言志》,兰州大学出版社,兰州。
- 吕叔湘(1980):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方言》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页85-122。
- 钱乃荣(1992):《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 陶寰(1996):《绍兴市志方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
- 王福堂(1959):绍兴话注音,《语言学论丛》3,北京大学汉语语言研究中心,北京,页73-126。
- 王洪君(1999):《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 吴宗济(1984):普通话三字组变调规律,《中国语言学报》2,商务印书馆,北京,页70-92。
- 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1981):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页145-155。
- 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1982):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二),《方言》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页145-155。
- 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1983):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三),《方言》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页197-201。
- 意西微色·阿错(2001):藏汉混合语“倒话”述略,《语言研究》3,华中科技大学,武汉,页109-126。
- 意西微色·阿错(2002):雅江“倒话”的混合特征,《民族语文》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页34-42。
- 袁稼华等(1989):《汉语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北京。
- 袁焱(2001):《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阿昌语个案调查研究》,民族出版社,北京。
- 张洪年(1985):镇江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页191-204。
- 张振兴(1992):《漳平方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 Bao, Z. (1999a). Tonal contour and register harmony in Chaozhou. *Linguistic Inquiry*, 30 (3), 485-493.
- Bao, Z. (1999b). *The structure of t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o, Z. (2004). Accentualism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5 (4), 863-889.
- Chan, M. (1985). *Fuzhou phonology: A nonlinear analysis of tone and stres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 Chen, L. and Norman, J. (196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Foochow dialect*.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
- Chen, M. (1987). The syntax of Xiamen tone sandhi. *Phonology Yearbook*, 4, 109-149.
- Chen, M. (2000). *Tone sandhi: Pattern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C.-C. (1973). *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andarin Chinese*. The Hague: Mouton.
- Hyman, L. (1978). Tone and/or accent. In Donna J. Napoli (ed.), *Elements of tone, stress, and intonation*, Washington, :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20.
- McCawley, J. (1968). *The phonological component of a grammar of Japanese*. The Hague: Mouton.
- Mufwene, S. (2001).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uysken, P. & Smith, N. (eds.), (1986). *Substrata versus universals in creole genesi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homason, S. G. (2001). *Language contact: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Thomason, S. G. and Kaufman, T.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einreich, U. (1964). *Languages in contact: Findings and problems*. The Hague: Mouton.
- Winford, D. (2003). *An introduction to contact linguistics*. Malden, MA.: Blackwell.

注释

* 2004年5月我以兼职研究员身份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作短期访问研究，并作了一次演讲。本文是在演讲稿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我衷心感谢陆俭明教授对我的支持和鼓励，给我机会访问北京大学。同年8月我在上海参加了由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办的汉语历史层次会议，并宣读本文的初稿。两次演讲许多同仁给我提了珍贵意见，特别是陈保亚、丁邦新、李如龙、李小凡、陆俭明、陶寰、王洪君和游汝杰诸教授，我在此深表谢意。文章的错误之处由我自己负责。

本文的研究与写作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院研究基金的资助，项目号码为 R103-000-015-112、R103-000-035-112。

¹ 国外接触语言学的经典著作 Weinreich (1964) 虽然是在四十多年前出版的，至今依然是必读之物。Thomason & Kaufman (1988) 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几个常见的结构制约，并作了评估，认为这些结构制约是受了结构主义理念的影响，与具体的语言事实颇不相符。上世纪下半叶，在生成语言学的影响下，美国洋泾浜语、克里奥尔语界对接触语的发生机制进行过激烈的辩论。语言共性、底层语言是这场辩论的焦点（见 Muysken & Smith 1986）。最近海外出版了一些教科书介绍海外接触语言学的现状和热门课题，如 Mufwene (2001)，Thomason (2001) 以及 Winford (2003)。国内语言学界在语言接触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戴 (1992)，陈 (1996)，袁 (2001)，意西微色 (2001) 等。

² “展览馆”的“览”字吴 (1984) 作 42，我把 42 认作是 21 的环境变体。学者对北京话三声变调的描写在细节上有相当大的差异。(11) 是吴 (1984) 的标法，是规则 (10) 的材料根据。Cheng (1973) 和 Chen (2000) 把单双格和双单格分别标成 (i) 和 (ii)：

(i) 214-[214-214] → 21-35-214

(ii) [214-214]-214 → 35-35-214

本文的一位匿名审稿人也把“展览馆”看成是(ii)的例子。无论怎么看三声变调的细节, 词的内部结构在变调中的作用是肯定的。因此, 这些差异不影响本文的立论。

³吴(1984)的材料有些不一致的例子。“省美展”和“展览馆”的调形不同, 但是“[保险]柜”和“老[百姓]”却有相同的调形(214-214-51 → 35-21-51)。这是和Cheng(1973)、Chen(2000)不同的地方。我们这里不打算详细讨论;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相关的文献。

⁴调类命名规范: I, 平; II, 上; III, 去; IV, 入; a, 阴; b, 阳。不标 a, b 的表明阴阳差别消失或不重要。声调调值往往因学者而异, 我们一般沿用所引文献的标法。

⁵Ia、IIa、IIb 三调在陶(1996)一文里分别标为 53、335、113。如此细微的差别没有音系上的意义。三十多年期间绍兴话的声调调值基本上没有变化。陶文没有讨论连续变调。

⁶(25)式中首字为 IIIa-/IIIb-的末字亦可作 55/33。

⁷我们只考虑急读变调。张洪年写道: “多字组急读的时候, 一般以最后两音节为重点, 声调变化谨守连续变调规则。前面的字, 除去入有时保留高平以外, 其余一律读作中平 33。去入高平调的字, 假如是无关紧要的字眼, 也可以读成中平。(张 1985:197-198)”

⁸袁等(1989: 84)所列的例子中, 有一些并不符合二字组的变调规律, 如“马兰头”的“马”和“白开水”的“白”词汇调都是 13, 按规律变调应是 11(见(48)), 但是, “马”标为 11, “白”标为 22。

⁹近几年来, 不少学者着力研究汉语声调的类型, 比如王(1999), Chen(2000), 和李(2004)。王(1999)、Chen(2000)主要是从规则的结构特性进行分类, 而李(

2004) 把重点放在变调的结果上。由于研究视角不同, 提出的类型也不同, 本文不算一一加以评论。